

# 重建大学理想

——新中国高教改革发展道路的反思与展望

刘 振 天

把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入 21 世纪？这是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科技文化社会能否实现腾飞的大问题。这一问题近年来引起我国广大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在理论上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而正在展开着的轰轰烈烈的改革实践，无疑是在为新世纪做着准备。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高等教育改革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千头万绪。既要处理好高教内部诸因素、诸活动之间的关系，又要理顺好高教与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外部关系。而就整个高教改革来看，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观念变革是先导。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高等教育改革能不能取得成功，就是要看我们是否有一套正确的思想、观念和理论。

所谓的教育观念，就是人们对教育的本质、教育的价值、教育的功能、教育发展等基本看法和态度。教育观念之所以为先导，是因为它制约着教育目标的确定，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运用以及教育组织、管理的取向。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或国家，教育观念存在着差异。但是，这种差异又不是无限度的。那些正确地反映教育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观念，是一切教育都必需的。

支配高等教育生存和发展并体现高等教育规律的观念系统，就是大学的理想\*。每一个国家的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理想。具体说来，大学的理想，它阐明大学是什么，大学要干什么，大学应该如何运作等问题。

## 一、中国在呼唤大学的理想

大学理想，从前对于我们大多数中国人来讲，恐怕是一个比较陌生的概念。可在今天，它开始成了人们谈论的一个话题，而专家学者们也在悉心思考、研究和描绘着 21 世纪中国大学的理想。

这绝非偶然。

\* 高等教育与大学不是同一个概念。这里混同用，主要考虑大学已经变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当然，高等教育主要是指大学本科以上的教育层次。

首先从国际范围内来看。近代产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和科学获得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源源不断地增长。与此相应,教育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中等教育基本普及,高等教育出现了大众化的局面。各主要发达国家在二战后,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迅速扩张。到70年代,高等学校就学率就已经达到同龄人口的20%以上,80年代末达到40%以上。个别国家,如美国,高等学校就学率甚至超过了50%,进入了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大发展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物质财富的增长,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发展,并没有真正地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也并未真正实现人们当初设想的能够给世界、给人间带来光明和幸福这一美好前景。相反,却平添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比如,生态失衡,核战争威胁,经济危机,贫富分化加剧,社会道德滑坡,人际关系疏远,贪图物质享受,精神生活贫乏空虚,个人主义利己主义严重,缺少关心和负责,社会犯罪率上升,等等。这些现代社会病症引起了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忧虑,也促使他们对现代科技和高等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他们尖锐地指出,产业革命以来的高等教育制度不仅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甚至进而有使之加剧的危险。因为近代以后的高等教育已经偏离了大学的初衷,它把大学的理性沉思和社会批判的理想抛在一边,完全为社会的功利所虏,从而陷入了丧失主体地位的屈从于经济、科技和市场需要的工具。大学不再有自己的目标,大学被异化了,它变成了单纯生产和训练劳动力的车间,教给人专门化的职业知识和谋生技能,遵循着有用即真理的逻辑。这种单一的、片面畸形的实用主义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专门人材,可能掌握了大量的专业技术知识和高度的职业技能,能够为国家为雇主为个人带来物质利益,但这样的人只是一个经济人、技术人,说到底是一个“单向度的人”。他虽有知识技能,但却缺乏教养,缺乏洞察和体悟人生目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幸福的智慧,从而不可避免地为眼前的物质利益所迷惑,难以担当起促进人类社会进步的使命。因而,有些西方学者呼吁,要变革现代大学的制度,要恢复大学的传统。而所谓“恢复大学传统”,其实就是中世纪以来古典大学一直奉行的理性主义、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和博雅教育之理想精神。并冀望通过此途复兴人文理性,以解决社会面临的危机。

本世纪初以来,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高等教育改革浪潮。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改造主义、要素主义、存在主义、人本主义等流派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改革实践纷纷登场。这些主义的一大共同特点就是企图在大学传统中发现和挖掘出救治现代社会和现代高等教育病症的灵丹妙药。比如,永恒主义教育哲学代表,芝加哥大学校长赫钦斯明确提出了他的大学理想。他认为,现代大学教育应当以发展人的健全理性,形成人的智慧,养成人的至善品格,造就有教养的“完人”为目的。为此,他主张大学要实施通才教育,加强大学的学术性,提倡学习具有永恒价值的古今名著经典。大学应该自治,要独立于社会之外,保持价值中立,不受社会政治和市场的左右。认为大学也要为社会服务,但这种服务应主要通过传播和发展高深学问以及造就有教养的和谐发展的“完人”来实现。同时,服务不是跟在社会后面亦步亦趋,而应该引导社会朝向符合人的发展的方向前进。

当代西方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高等教育问题的认识、揭示和批判,应该说是深刻的。但因受其阶级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们只是把这些问题、弊端和矛盾简单地归结为科技和教育本身,归结为大学传统的丧失或理想选择的偏离,则是片面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

真正地揭示出导致现代社会异化和大学理想旁落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性，因此也就不可能真正指出克服和消除社会异化的根本途径。尽管如此，他们关于大学理想的阐发和大学改革的实践，对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尤其是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有很大的启发。

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与已有 700 余年历史的西方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虽然至今还不足百岁，但从第一所大学建立开始，就在不断地寻找和努力地塑造自己的理想。怎奈现代高等教育是西方的产物，所以，旧中国不得不效法西方大学的模式来确立自己的大学及其理想。正如民国初期曾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并兼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所指出的，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任务是要仿效欧洲的形式，建立自己的大学。蔡元培“依各国大学通例”，主要是德国柏林大学模式，确立了北京大学的理想。他认为，大学应该以研究高深学问为天职，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为方针，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科学与人文相统一，教育独立，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其目的在于培养造就具有整治和改造社会制度的完全人格的人。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救国思想。

蔡元培先生为北大确立的理想，其实也是旧中国多数知识分子追求向往并为之抗争奋斗的大学的共同理想。但旧中国内忧外患，加上腐朽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这种理想至多只是人们的一种良好愿望而已，无法真正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社会主义制度在理论上使一切旧制度下所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异化现象，失去了其社会基础。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真正进步创造了广阔的前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发展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建国至今，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在发展中也不是没有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面临的社会问题，在我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有时候表现得甚至更为尖锐。当然，这首先不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固有的，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目标就是要消除这些矛盾。产生问题的根源，主要还在于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独立创造，没有自己的现成的经验和模式可寻；在于人们思想认识上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真正弄清；在于受“左”的因素影响和我们的政策存在的许多失误。当然，也与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和办学体制上的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实事求是地讲，建国以来，我国高等教育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和输送了大批专门人才，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功绩是主要的，这是必须肯定的，否则就很难解释几十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失误也是相当严重的，不仅影响高等教育作用的正常发挥，甚至还使它产生了与社会发展方向相背的一面，即高等教育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不仅表现在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数量、结构、规格和素质等远不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在科学文化的发展中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方面，而且表现在违背和破坏规律给高等教育带来的严重损失方面。导致高等教育的负效应的原因是很多的，但在我们看来，恐怕主要还在于高等教育办学思想或者说大学理想上出现的偏颇造成的。实际上，从新中国建立伊始我国高等教育就已经埋下了隐患。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这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不过，我们过分地强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社会制度下高等教育的区别、对立和斗争，没有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性和一致性。因此，在高等教育

办学思想和办学模式的构建中，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高等教育体制及其模式问题上，我们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批判的多，继承的少。我们基本抛弃了几百年来西方大学所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传统，继而学习苏联经验按照苏联的模式建构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这种高等教育模式所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理念？它有什么特点？

第一，它把高等教育看成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看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从而强调高等教育要为社会政治服务。高等教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体现了教育的社会阶级性质，也体现了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这是完全应该的。然而，如果把政治因素不恰当地夸大，几至唯一，那么，对高等教育无疑会造成巨大损害。这一点已经为新中国建国四十余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所证实。过度政治化给高等教育带来的灾难，人们至今仍记忆犹新。

第二，与上一问题相关，由于把教育看作是政治工具，因此，大学就必然被当成政府职能部门，对高等学校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高等学校在招生，专业和课程设置，人事安排，学籍管理等方面完全听从于政府的行政命令，大学自身是没有什么自主权的。

第三，强调高等教育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新中国建国初期，我国根据这一基本原则进行了大规模的高等院校调整，确立了高度分化的专门教育体系，按国民经济部门、行业甚至产品种类来设置院校、系和专业，国家实行计划招生计划分配。这种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地发展高等教育，在迅速培养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发展所需要的实用人才方面，以及在克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等教育发展的自发性和无政府性所造成社会问题等方面，确实发挥了作用。但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专业划分过多过细，在教育内容上过分重视工程教育和科技教育，人文和社会科学教育重视不够。所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基础不宽，视野狭窄，人文素养低下，生活品位不高，适应和变革社会的意识和能力较差。

此外，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方面表现出整齐划一性。这虽然可以避免高校之间水平过分差别，从而保证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但却限制地方、高校以及教师、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反而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新时代，高等教育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近二十年来，我们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致力于高等教育体制和办学模式的改革。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的宏伟构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无论是在观念、体制方面，还是在课程和人才培养方式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比如，通过改革，大学的科研职能得到了加强，大学正在向教学和科研两个中心迈进；高等教育的自主权在逐步获得和扩大；学科和专业结构得到拓宽，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逐步合理，人才培养注重个性，等等。所有这些改革，都是在试图逐步摆脱苏联教育模式的束缚，大胆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经验，重新确立我们自己的大学理想。

但是，几十年来业已形成的高等教育体制和办学模式毕竟根深蒂固，短期内一时难以有大的突破。加之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缺乏足够的准备，所以，高等教育在面向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又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高等教育正在经受着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当然，市场冲击高等教育，不是人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有其必然性。市场冲击高等教育，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不合理性的一面。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高校在面向市

市场经济过程中，产生了许多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现象。有人提出高等学校要产业化和市场化的主张。有些高校的领导，眼睛只是一味地盯着市场，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不是放在如何提高大学的学术水平上，而是忙于办班，忙于搞创收上。什么专业热就办什么，什么见效快就来什么，什么赚钱多就干什么。也有不少大学师生，把主要力量不是用于教学科研和专业学习上，用于如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生命质量和生活意义上，而是忙于经商、下海、赚钱上。大学仿佛是个大生意场，校长、教师、学生仿佛成了生意人，成了挣钱机器，教育蜕变为商业行为。金钱、功利正在侵蚀高等学府，破坏着大学的神圣和尊严。当前的大学多了时髦和浮躁，少了昔日的深沉和宁静；多了顺从和趋炎，少了过去的独立和批判。马克思曾经说，教育是市场经济的伟大抗毒素。然而，我们的大学似乎不是在起抗毒素的作用，不是大学引导市场，相反，而是市场引导大学，大学在接受市场经济自发毒素的影响。因此，近些年来，高等学校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惑、焦虑和担忧的现象，比如，知识贬值，学风不正，学术空气淡薄，过分追求学术之外的功利价值，基础学科和专业，尤其是人文学科和专业不受重视，大学文化素质普遍低下，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金钱至上主义抬头，出现了理想、道德和信仰危机，等等。正如人们所讽刺的，当今的大学生，不乏知识，但缺教养；不乏文化，但缺文明。大学教师也缺少学者的生活方式和内在气质，即缺少追求真善美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和鄙视、贬抑金钱、权力、地位等物质享受而专注内在精神世界丰富的文人品。它已经向人们发出了警告。所有这些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大学的过分工具主义，功利主义，迷失自我，丧失主体，理想旁落的结果。

总之，面临新的时代，面临国内国际形势，每一个有责任心的人都在强烈地思考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思考着肩负塑造民族未来的高等教育的使命，思考着如何重塑中国大学的理想问题。

## 二、中国如何重建大学的理想

上文主要分析并阐述了中国重建大学理想的社会背景及其迫切性。我们认为，中国的大学现在确实到了重建其理想的时候了。但是，构建大学理想又不是一件简单的和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解决诸多思想认识问题，而且需要处理好办学过程中的各种关系和协调好各种矛盾。因此，下面，我们再稍加详细地讨论这样两个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理想？如何构建中国大学的理想？

理想，大至人类社会、国家民族，小至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生活构成。不只如此，理想首先是社会、国家及个人生活和发展的航标、进步的动力。人类失去理想，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走向倒退；国家民族缺乏理想，就会衰落灭亡；个人没有理想，生活就会浑浑噩噩，暗淡无光，毫无意义。这些都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同样，大学也需要理想。不单需要，而且至关重要。这是大学的本质及其特点决定的。作为培养和造就高级专门人才的场所，大学在人的发展中，在整个社会的进步中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然而，大学的这种作用是否发挥出来，能发挥到什么程度，其作用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是长远的还是切近的，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是增益的还是损益的，等等，首先取决于大学理想的选择。

在东西方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在关涉大学理想问题上，主要存在四种不同的观点，或者

说存在四种不同的大学理想模式。即人文主义理想,知识(学问)中心主义理想,社会本位(工具)主义理想和人本主义理想。

人文主义理想,产生于英国中世纪以来的古典大学,主要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为代表。这两所古典大学当时主要是为教会培养神职人员和为世俗国家培养政府官员,即培养世俗社会和教会的领导人。而这些人被看作是社会的精英,社会的进步主要取决于精英的素养和品质。在精英的素养和品质之中,以教养和人格最为重要。所以,这种理想认为,大学的本质和它的最重要的目标不在于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不在于学识和才能的获得,而在于人的德行、情操、教养的养成。教养比高深知识更重要,培养有教养的人比培养知识分子更重要。大学的陶冶价值高于传授价值,通过陶冶使人的灵魂得到净化和升华。为达到这一目的,大学设置自由学科,实施普通教育和博雅教育,反对专业训练。人文主义理想在今天虽已不是大学理想的主流,但其理念在某些国家,特别是在英国传统大学中得到较多的保存。

知识(学问)中心主义理想是一种唯理性主义哲学,美国高等教育家约翰·S·布鲁贝克把它称为“认识论”理想。它也产生于中世纪大学,但形成于近代大学。以德国为代表。这种大学理想把知识和学问本身作为目的。认为大学的本质是研究高深学问,探求和传播真理。认为只有高深学问和真理才是真实可靠的,才是永恒的。因此,大学必须教授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知识和学问,培养学生的理性和探索精神。强调古典人文学科的教学。19世纪初开始,德国新人文主义教育改革家洪堡德创办了柏林大学,确立了“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大学理想,从而把自然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引进大学课程,同时也扩大了大学的职能,改变了大学的生活方式。然而,柏林大学的理想仍然强调大学的纯学术研究和教学,在研究中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大学遵循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原则,反对外部力量的干涉。德国大学传统对欧洲乃至世界各国大学近代化都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中世纪大学的人文主义理想和近代大学的学问中心主义理想,遵循的是大学的内部逻辑。由于它反对外部力量的干涉,固守学术自由自治,拒斥社会变革的要求,最终使之与社会生产生活越来越远。因此,产业革命后,这种大学的传统理念及其办学模式从此衰落下去。它被一种新的大学理想所取代。这就是社会本位主义理想。

社会本位主义理想是一种工具主义或功利主义教育哲学。布鲁贝克也将之称为“政治论”理想。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大工业的发展要求大学为迅速变革着的社会服务,培养学以致用型的实用型人才。这种大学理想认为,追求知识和真理不是大学的目的,知识和真理只是解决学术问题以及各种商业、工业、政治和社会等问题的手段,大学不仅仅要遵循知识自身的逻辑,而且更要体现国家、政府、社会、市场、学生的意志和要求;大学不能只满足于求真,更要求用,而且求真是为求用服务的,以“用”为最终目的。认为大学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培养模式都应该根据社会,确切地说,是根据职业、根据市场的变化来运作,大学要由政府来控制,由市场来引导,社会来干预。这种功利主义理想一开始就遭到传统大学的坚决反对和顽强抵制。由于传统大学及其理念势力强大,迫使新兴资产阶级在传统大学之外另辟新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英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新大学运动”,政府开办了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即多科技术学院来为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实用人才。19世纪下半叶,美国高等教育受其实用主义哲学影响,开始摆脱殖民地宗主国英国的模式,逐渐确立为地方经济和社会服务的理想。《莫雷尔法案》的颁布和赠地

学院的开设是这一理想的开端，而20世纪初的“威斯康星思想”更集中和鲜明地表达了美国大学的实用主义精神。19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发展，大学的工具性和功利性日益显著。虽然为社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掌握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专门人才，给国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也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一些人文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的忧虑。纽曼、维布伦、赫钦斯等人起来批判大学的功利主义倾向，捍卫大学传统的尊严和纯洁。从而掀起了不小的复兴大学传统理想的运动。尽管并未在根本上扭转大学的功利主义和工具化的状况，但人们似乎又在复兴传统中看到了大学的希望。

知识中心主义理想和社会本位主义理想，其实质都是一种唯理性主义教育。前者是科学理性，学科知识理性，后者是技术理性和工具理性。归根到底是科学主义和技术至上主义。知识中心主义教育信奉的是精英教育和尖子教育，它维护的是一种等级的教育制度，必然把大多数人排斥在大学校门之外。同时，它过分地强调理性，把知识和真理绝对化，是典型的学科中心论，是“重书不重人”、“重学科不重学生”的教育，从而必然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学生的情感和意志，压抑学生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社会本位主义大学理想虽然奉行大学要满足社会和求学者愿望，主张高等教育大众化，然而它却把大学看作是生产劳动力的工具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手段，因此，它同样忽视人的目的性的存在，从而抹煞学生主体的多样性需求，尤其是发展个性的要求。面对这些问题，20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主要是知识界掀起了反对唯理性主义教育的人本主义思潮。人本主义就是非理性主义，其基本的信条是“存在先于本质”。它反对任何理性和权威，反对传统的科学主义教育和工具主义教育。认为理性主义教育是一种使人变成物、变成机器的教育，它使人只有理智而没有情感，只有肉体而没有灵魂。主张“人”的教育，主张要重视人的价值，尊重学生的主体意志、主体精神、主体人格和主体选择。强调要把学生看成是一个完整的诗化的生命存在，强调学生的非理性因素，即意志、直觉、感悟、体验、情绪、欲望等因素在教学过程的作用。

人本主义大学理想反对传统理性主义教育的普适性规则、划一性和强制性模式，主张大学自由。但它的自由又与知识中心主义的学术自由自治观不一样，它更重视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自由，重视学生的选择自由。今天，在西方，非理性主义大学理想有广泛市场。而所谓的“自我设计”，“自我实现”等理想，在我国大学生中也有较大的影响。它对变革僵化的传统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而提高人的主体性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以上我们主要列举了四种大学理想。从中可以看出，这四种大学理想在大学的发展史上大体上是顺序地出现的，并曾各自在不同阶段、不同国家成为统治大学的意识形态和主导理念。这也说明，大学的理想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在发展和变化。一种大学理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或者说一种理想的确立和选择，是由多种因素和多种条件决定的。英国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指出，大学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也就是说，大学的理想是其内部力量和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前文我们谈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还不足百年。但是，从清末到现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高等教育的发展却苍桑曲折，历经坎坷。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这一史无前例的灾难，大学的规律和传统遭到严重破坏。如果问我国的大学是什么理想，当然完全可以说是“政治论”理想，而且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论理想。然而，又是一种变了形的政治论理想，恰恰是这种政治理想和斗争哲学几乎断送了中

国大学的命运。

当前,中国正处在一个新旧体制交替时期,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和模式已经不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但新的理念和新的体制、模式尚未形成。这对中国高等教育而言,既是挑战,更是确立其新的理想的机遇。那么,中国大学应该确立一个什么样的理想?上述四种理想是否适合于我国,或者说,能不能从上述几种理想中选择一种作为重建中国大学理想的模本?显然,简单地照搬是行不通的。因为每一理想不单是遗传的产物,也是环境的产物,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只能分析研究其实质,从中发现规律。上述四种大学理想,都涉及到了关于大学的本质、大学的价值和功能、大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等问题。具体说来,每一理想都是围绕如下关系展开的:学术与政治,求真与求用,自由与限制,等等。对这些问题、关系的看法、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所确立和形成的理想也就不同。中国构建大学理想,起码要考虑到以下几方面因素,即:考虑中国的国情和社会性质;考虑大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考虑中外古今大学发展的经验教训;考虑当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背景和趋势。这些因素要求我们在建构中国大学理想时,应该处理好下列关系或解决好如下矛盾,即:学术和政治的关系;求真与求用的关系;自主与控制(独立和依附)的关系;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普通教育与专业训练的关系;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传统与变革的关系;求同与特色的关系,等等。

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求真与求用的关系,自主与控制的关系,这三者其实都涉及到了大学的性质、目标、方向及其运作等问题,即大学的学术导向与政治导向或社会导向的关系问题。“认识论”理想和“政治论”理想在这些关系上各执一端,其中既有合理性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就“认识论”理想而言,它强调了内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依据,大学的存在和发展,首先必须符合其内部逻辑,遵从大学学术自身的运动规律,即大学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教授治校。否则,若无视这一点,则必然给大学带来危害。这是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它又把大学的内部力量的作用无限夸大,从而在根本上忽视大学存在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否定社会对大学的合理要求。这种理想的极端性,使大学成了象牙塔,变得封闭和保守,严重脱离社会需要,这也就是中世纪大学之所以衰落的原因。事实上,脱离社会的教育是不存在的。近代以来,高等教育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大学在国家、社会生活中越来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社会对大学不可能放任自流,也不可能把它完全交给学者自己,必然对大学提出各种要求和规范。而大学只有不断地满足这种要求,才能获得持续发展,从而不致于被社会抛弃。在当代,大学的社会导向是必然的,完全的“认识论”理想是不存在的。但社会导向又不是毫无限度的,若以社会导向取代大学的学术导向,那就会导致大学的毁灭。所以,重要的是要在几者之间找到一种平衡,不能把它们对立起来,不能顾此失彼,非此即彼。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高度集中统一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使大学受外部力量的制约过大,工具性过强,大学内部力量得不到多少体现。因此,在坚持社会导向的前提下,要加强大学的学术导向。总之,处理这几者关系,其实质与核心就是大学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依据社会需要和按照教育规律办学,扩大大学自主权,繁荣和发展学术事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大学理想在办学的服务方向上的表现形式。关于这个问题,社会

本位主义理想和人本主义理想长期以来也是在一直争论,并由此形成了教育价值上的个人本位论和社会本位论两种对立观。个人本位论认为,在教育中,人及其价值是第一位的,所以教育的价值主要在于满足个人需要,促进人的身心和谐发展;而社会本位论认为,教育中,社会的需要是第一位的,单纯的个人价值是不存在的,个人的价值取决于社会价值,因此,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两种不同的发展观和价值观,把个人和社会完全对立起来,因此,不可能求得问题的解决。实际上,社会和个人需要之间既矛盾又统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对抗性。但长期以来,我们过分强调了社会需要,忽视个人需要,忽视个人发展兴趣、专长、个性的需要。因此,在构建我国大学理想时,在满足社会需要的情况下,应该侧重强调满足个人需要。

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是大学理想在教育内容上的反映。人文主义理想、学问中心主义理想和人本主义理想多强调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反对专业教育和训练,而社会本位主义理想,功利主义理想和工具主义理想,则多重科技教育和专业教育、职业教育,它们之间也存在对立和分歧。从大学发展史上看,近代社会以前的大学教育,大多为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而近代以后,特别是现代,大学教育中,科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占据主导地位,大学中也开设一定的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学科课程,但是比例很小。总的说来,是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式微。科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加强有其历史必然性,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但由此排挤和削弱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则直接影响专门人才的整体素质。故而,当今世界掀起了复兴人文主义教育运动。我国高等教育自新中国以来,就实行过窄的专门化教育,大学的基础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不足。近年来虽有所改变,但还远远不够。应该加强大学的普通教育和人文教育。

构建中国大学理想,不能凭空想象,必须根植于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百年来高等教育,尤其是新中国以来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同时大胆学习借鉴国外经验,从而形成我们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中国大学的理想。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崇尚科学,追求完美;办学自主,适度调控;造就英才,体现公平;发展个性,服务社会。

大学的理想,既要体现我们社会的性质,又要表达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既要遵循大学的内部规律,又要符合大学的外部规律;既要通过变革以适应社会,又要通过保留传统以超越现实。上述我们对中国大学理想的概括,可以说,充分考虑到了这几方面的关系。它是新时期中国大学的灵魂。有了这种理想,我们才能造就出一代又一代有理想的新人;有了这种理想,我们的大学才能生生不息,开拓进取!

#### 本文主要参考文献:

- 1 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
- 2 阿什比著,腾大春等译《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
- 3 潘懋元、王伟廉主编《高等教育学》,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
- 4 顾明远《大学的理想和市场经济》,《比较教育研究》1994年第2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忠